

· 丝路医药 ·

# 元代色目医与中原医疗体系之变易

张田芳, 杨富学

(敦煌研究院, 兰州 730030)

**摘要:** 元代有大批色目人东来入居中原, 主要有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刺鲁、吐蕃等。蒙古西征, 将大批色目工匠和医生带入中国, 加速了色目医学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在色目医的影响下, 元代在中央设立三个由色目人主持的回回医疗机构, 即广惠司、大都回回医药院和上都回回医药院, 并在地方兴办医学校,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医学人才选拔系统, 以新增骨科并单独成科为特色。元代虽继承了宋代的惠民局, 但主要用于医疗贫民, 与宋代惠民局主要为宫室服务大相径庭。随着入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增多, 在地方上也出现了色目人所开设的医院。这些都促成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大变革, 不仅有利于元代医学的发展, 更为嗣后明清中医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 色目医; 医疗机构; 医学校; 《回回药方》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4.005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4-0337-09

## Semu Medicin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System in Central China

ZHANG Tianfang, YANG Fuxue

Dun Huang Research Academ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Semu people came to and settled in Central China, including Huihui, Tangut, Naiman, Onggud, Uighur, Kangli, Kepqak, Asu, Karluq, Tibetan, etc. With the Mongolian army's western conquer, large batches of artisans and doctors were brought to China,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Semu medicine in Central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mu medicine, the Yu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ree supreme Huihui medical institutions presided by Semu officials, namely, the Universal Benevolence Bureau (广惠司), the Kanbalu (大都, now Beijing) Huihui Medical Institute and the Xanadu (上都) Huihui Medical Institute. Medical schools were also set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forming a united medical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nationally with the newly-set separate discipline of osteopathy as a characteristic. The Hui Min Ju (惠民局, Medical Institute of Benevolence) inherited by the Yuan dynasty differed in its focus on treating the poor from its counterpart of mainly serving the royal court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increasing immigrants of Arabs and Persians, there also appeared local hospitals opened by Semu people. All these

**【基金项目】** 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专项课题 (22ZC69)

**【第一作者】** 张田芳 (ORCID: 0000-0003-0299-3934), 副研究馆员, E-mail: 812403531@qq.com

**【通信作者】** 杨富学 (ORCID: 0000-0002-2091-9351), 研究员, E-mail: 1584322834@qq.com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Yuan dynasty, but also ushered in a broader prospect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Keywords 】 Semu Medicine; Medical Institutions; Medical Schools; *Huihui Formularies*

元代曾大批胡人入居中原，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刺鲁、唐兀、乃蛮、汪古、吐蕃、阿儿浑等。有元一代，色目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文化领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两宋时期（960—1279），“阿拉伯医学体系已经全面形成，并向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区广为传播。随着这一传播，它又容纳了新的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学成果，因而，成为一种以阿拉伯医学思想、治疗方法为主体的具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新医学。这种新医学必须并且只能泛称为伊斯兰医学。这一时期，一些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医书的抄本传到了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医学经典被译成拉丁文，可谓是伊斯兰医学的黄金时代”<sup>[14]</sup>。蒙古西征，将中亚、西亚的大批工匠和医生带入中土，加速了色目医学在中原的传播，对元朝医疗机构的设立及中华医学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一、色目医与蒙古贵族

中外医学交流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随着中外交流领域的扩大，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医药学往来愈加频繁。然而就医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当以元代最具代表性，无论是医药的传入还是医学理论的渗透，都是史无前例的。

元代医药交流的扩大与蒙古贵族对医学的推崇有极大的关系。蒙古地处高寒区域，本就容易滋生疾病，加之蒙古帝国四处征伐，因水土不服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常如影随形，致使历代统治者都对医学非常重视。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以遂他的夙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性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sup>[2]180[3]212</sup>而蒙军在攻打重庆合川钓鱼城时，因当地气候炎热，军中染疫，士兵死亡者甚众。蒙古国时期的西征为蒙古帝国分裂之后的元代揭开了其中外医药交流活动的序幕，中原与回回医药的交往由此而始。蒙古统治者为了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求，在征战中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工匠、艺人等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加上蒙古人在宗教信仰上不受传统的束缚，诚如志费尼对成吉思汗的认识一样，“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成吉思汗）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sup>[2]26[3]29</sup>，故而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态度。由于中世纪宗教与医学密切相关，这一包容态度为中外医药交流大开方便之门，而宗教徒的医药活动也成为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传播方式。

蒙古贵族患病时，往往会集各医家之长，而非专用一家之方。因此，在蒙古贵族周围就有中医、回回医、基督教医与佛医。1220年3月，拖雷随父攻打中亚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时患病，当地名医撒必为之祈祷医治，方告痊愈，于是撒必被封为“答刺罕”，蒙古初期最为尊贵的封号，并被委任为太医，事见《至顺镇江志》卷九《镇江大兴国寺记》碑：

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撒马尔罕）在中原西北十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虚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薛迷思贤，地名。也里可温，教名也。

公(马薛里吉思)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sup>[4]</sup>

邱树森通过对该《镇江大兴国寺记》中“马薛里吉思”“可里吉思”以及“父灭里”等人名词源的考证,认为薛里吉思家族实为居住于撒麻耳干之基督教世家<sup>[5]</sup>。

察合台病重时,主治大夫为来自波斯的麦术督丁(Majd-ad-Din),“这个人尽他的一切能力来治疗察合台的病,表现出很大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察合台死后,其长妻也速伦(Yesülün)下令把他们(胡只儿和麦术督丁)两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sup>[2][150][3]272-322</sup>。这些基督教医师显然皆景教徒,但以回回医药侍奉元定宗贵由。贵由(1246—1248)多受基督教徒王傅合答、大臣镇海的影响,“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八吉打、阿速(As)和斡罗斯(Rus)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务的也大部分是基督教医师”<sup>[2][259][3]301</sup>。泰定年间(1324—1328)留居于大都(今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 1265—1331)在其旅行记中对元宫廷的规章礼仪等有不少记载<sup>①</sup>:

给御体看病的医师是四百偶像教徒,八名基督教徒,及一名撒刺逊人。所有这些人都从皇帝的宫廷领取他们需要的供应。<sup>[6-7]</sup>

“这里的‘偶像教徒’指宫中供奉的佛僧和道士等(也可能指太医院一类医药机构的医生),撒刺逊人即伊斯兰教徒,而基督教徒恐亦多为景教徒。虽然对上述回回医生和汉族医生间的医药交流活动缺乏具体记载,但照常理,他们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相互间抑或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而围绕在蒙古最高统治者身边的回回医生,对后来回回医药专门机构的设立,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sup>[8]</sup>上述来自不同地区的医生,在蒙古拥有很高的地位,每逢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都会伴驾君王,如农历大年初一,皇帝都会召集王公大臣设宴庆祝,彼时百官跪拜朝贺,其中就有医生。马可波罗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记载了当时朝拜的情景:

尚有言者,节庆之日黎明,席案未列以前,一切国王、藩主,一切公侯伯男骑尉,一切星者、哲人、医师、打捕鹰人,以及附近诸地之其他不少官吏,皆至大殿朝贺君主。其不能入殿者,位于殿外君主可见之处。其行列则皇子侄及皇族在前,后为诸国王、公爵,其后则为其余人,各按其等次而就位。<sup>[9]224</sup>

一般而言,大型活动都会讲究座次,医生被排在第5位,前于许多朝官、地方县令、各地长官以及各种武官。尽管历代都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御医,但如同元朝一般将医生至于如此之重要地位者却罕见。

围猎是蒙古人重要的活动,即使定居中原后,皇室每年还是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围猎活动。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云:“神元上世,北戴斗极以立国,寓兵法于猎,开阖聚散严矣。”<sup>[10]</sup>在蒙古人眼中,围猎并非单纯的游戏,实乃作战方式的演练。诚如志费尼所言:“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这种(围猎)方式进行的。”<sup>[2][29][3]31</sup>当时的汉臣郝经亦指出:“国家(蒙古国)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sup>[11]</sup>职是之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都十分重视并经常主持围猎活动。每年大猎(一般是冬季)时,皇帝的妃嫔、子女、部分官吏都会参加,医生也位列其中,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提到了蒙古贵族狩猎时的私人医生:

此种帐幕之周围,别有他帐亦美,或储大汗之兵器,或居扈从之人员。此外尚有他帐,鹰隼及主其事者居焉。由是此地帐幕之多,竟至不可思议。人员之众,及逐日由各地来此者之多,竟似大城一所。盖其地有医师、星者、打捕鹰人,及其他有裨于此周密人口之营业,而依俗各

① Manuel Komroff (ed.),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Consisting of The Travel Records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of William of Rubruck [1253-1255]; The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i [1245-1247]; The Journal of Friar Odoric [1318-1330] & The Oriental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of Tudela [1160-1173]*, Horace Liveright, Inc., 1928.

人皆携其家属俱往也。<sup>[9]234</sup>

元代色目医的来源有两类：其一，战争所获之战俘。蒙古贵族西征时，屠城多有发生，但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匠人则采取保护态度<sup>[12]</sup>；其二，各类宗教人士，包括基督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政策，也吸引了部分宗教徒来中原弘教，而这些弘教者必备的技艺之一就是医术。除了战俘中的医生、景教徒、回教徒等域外传教士传授以及域外自发而来的域外医生向中原地区传输域外医学外，中原地区也有主动向域外学习医学者。早在五代时，中原地区就有医生在阿拉伯地区学医。拉齐（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a，或 Rhazes，865—925，又译为雷泽斯）为阿拉伯医学全盛时期中最知名的医学家，他曾在巴格达应一位中国学者的要求为其传授医书，事见阿拉伯著名书商伊期斯哈克（Abū'l-Faradj Muḥammad Bin Ishāq，？—996）所著之《书目》一书中。该书引述拉齐的话，云：

一位中国男人来到我家，在我居住的城里（巴格达）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语，会说会写，并且成为一位雄辩而精明的作家和神速的书法家。当他决定回乡时，他提前一个月对我说：“我即将告辞回乡。我想让人给我口述盖伦（Galien）的十六本书，好让我抄录下来……我找来了我的一位学生，要他帮我们这个忙。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口授，然而他写得比我们说的还快。我们核对时才相信，他抄写的是准确的。”<sup>[13]</sup>

宋元时期是域外医学向中原地区输入较为活跃的时期，尤其是元代。最初通过战争的方式迅速构建了域外医学与中原医学的交流渠道，随后色目人不断涌入，在中原定居，色目医学与中医的交流更是由被动变为主动，如明初由中原汉人编撰的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的《回回药方》就是很好的见证。是见，蒙元时期随着色目人在中原地区人数的激增以及地位的提高，色目人日常所需的回回医疗机构应运而生，这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对色目医生的倚重或色目医生的增多，而是此时色目人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影响着元代的政局，与之同时伴生的则为元代医疗体系的变革。

## 二、色目医与元代中央医疗机构

蒙古西征使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等地的色目人大批入住中原，彼时大都、杭州、泉州以及广州等地都有许多色目人居住，其中又以阿拉伯人居多，色目医学随之而来。色目医学高度发达，自然会引起中土人士的垂青。蒙古统治者本身对色目医就很倚重，加之各种因素的和合，引发了中原传统医疗机构的变革。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因战争、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不可抗拒的频发疫灾，尤其是规模大且持续时间长的疫情几乎相伴其始终，甚至元朝之亡也与疫灾息息相关。因此，具有色目医特点的医疗机构在元代的出现已成势之必然。

元朝的医疗机构是在宋金基础上形成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宋金之中央医疗机构大多是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元代则不然，循阿拉伯医学传统，在贵族之外，较多关注普罗大众。中统元年（1260）设立太医院，初为四品，大德五年（1139）升为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sup>[14]2220</sup>，下辖御药院、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官医提举司、医学提举司、广惠司、行御药局、大都回回医药院和上都回回医药院。太医院负责皇宫、两都及全国各种医疗事宜；御药院掌管、接收各族进献珍贵药品，制造汤药；御香局，负责皇帝的香药；御药局掌管全国除首都外各地药材的行御药局。在太医院下辖的机构中，有3个是在色目人影响下催生的，即广惠司、大都回回医药院和上都回回医药院。广惠司，至元七年（1270）设，其目的是为了“给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sup>[14]2221</sup>。在此之前，爱薛就曾领命设立京师医药院。爱薛在世祖朝颇受重用，其人又精通阿拉伯语。“中统四年（1263），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改为广惠司，仍命领之”<sup>[14]3249</sup>。人员设置上不断变化，“至元七年（1270），始置提举二员。十七年（1280），增置提举一员。延祐六年

(1319), 升正三品。七年(1320), 仍正五品。至治二年(1322), 复为正三品, 置卿四员, 少卿、丞各二员。后定置司卿四员, 少卿二员, 司丞二员, 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sup>[14]2221</sup>。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设大都回回医药院和上都回回医药院, 依然由精通回回医药的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医生充任。至治二年(1322)又将两院划归广惠司<sup>[14]2221</sup>。这3个回回医药机构的工作人员皆由色目人担任<sup>[12]</sup>。

除上述3个回回医药机构外, 另有一特殊机构, 即“惠民局”。该局初设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 “诏诸州置惠民局, 官给医书”<sup>[15]</sup>, 其职责主要是制药买药, 属于太府寺。元代沿用, 初设于窝阔台太宗九年(1237), “元立惠民药局, 官给钞本, 月营子钱, 以仆药物, 仍择良医主之, 以疗贫民, 其深得周官设医师之美意者”<sup>[14]2467</sup>。中统二年(1261), 元设大都惠民局, “秩从四品, 掌收官钱, 经营出息, 市药修剂, 以惠贫民”<sup>[14]2222</sup>。中统四年(1263)又设上都惠民局, 其后在全国各路均设。宋代惠民局属于太府寺, 太府寺初设于北齐, 其主要职能是掌金帛府库, 营造器物, 并非专管医药的机构。宋代惠民局的主要职能在于配药、买药给政府盈利而非救治贫民。元代这一机构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 其职能除了配药买药之外, 更注重救治贫民, 且主要负责人由“良医”充任; 其次, 不再属于太府寺, 而属于专管天下医药的太医院, 从单纯的盈利性机构转化为普惠性医疗机构, 属性大变, 元代的惠民局主旨在于医治贫民, 与宋代惠民局主要为宫室服务大相径庭。元代的惠民局具有医院的性质, 与宋代专事配药买药之职司迥然不同, 这一转变与阿拉伯医学的输入与影响不无关系。后来由于经营不善, 赔了官本, 各路惠民局都被罢停。成宗大德三年(1299), 疫病屡发, 大臣们甚是恐慌, 引起混乱, 群臣皆言“天变”, 成宗不信“天变”之说, 当即成宗下令恢复各路惠民局, 并对惠民局有过专门指示“各路置惠民药局, 择良医主之”<sup>[14]425</sup>, 使得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更详记其事:

大德三年(1299)春, 正月己丑, 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 大臣宜依故事, 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曲说耳, 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庚寅, 诏遣使问民疾苦, 除本年内郡包银俸钞, 免江南夏税十分之三, 增给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 择良医主之。<sup>[16]</sup>

尽管元代惠民局设立后成效不是很理想, 且一度废黜, 但阿拉伯医学中惠民之风在中原的影响当无已时。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医院出现于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此后历经1个世纪左右, 又有5所医院在巴格达开业。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医院, 则与十字军东征息息相关, 在领略了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和医院之便后, 始于13世纪在巴黎设立, 其时与巴格达的伊斯兰医院相差约4个世纪。据说, 巴格达的伊斯兰医院提供免费服务, 所有医院的建立与运营都主要仰赖政府的财政支持, 著名哲学家、医学家、物理学家拉齐(al-Rāzī, 864—924)曾出任巴格达医院院长<sup>[11]5</sup>。惠民局之类机构服务于普通民众, 与唐宋时代政府医疗机构主要针对贵族迥然有别。蒙古西征之前, 这些医疗机构在中亚、西亚发展较为完备, 蒙古入主中原后, 在医学上不似之前的王朝有严格的派别, 而是广泛接纳各种医学理念及医学人才, 因应这一形势, 针对大众的医院出现, 也在情理之中。

元朝还设有医学提举司, 专门管理医学校并从地方选拔医学人才。设官医提举司, 专门解决医疗纠纷, 负责治理医疗市场的混乱和假药买卖问题。元朝医疗机构从药材的采办、制药、售药、医生的培养、人才的提拔以及医疗市场的管理等,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比较理想的管理机构, 如果运行良好, 一旦疫情暴发, 从太医院到各路惠民局, 各地还有医户, 组织医护及时救治, 可为救灾赈灾赢得宝贵的时间, 从而避免瘟疫大范围的传播。元朝的医疗机构, 纵然不是全部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 但惠及贫民、利益普罗大众的观念与实践当得益于阿拉伯医学, 也势必对明清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三、色目医学与元代官办医学校

阿拉伯医学培养人才的途径主要是设立医学校, 采取严格的考核制度, 通过考核之后才能担任医生

一职。元朝亦有类似的情况，创办医学专科学校，充实医学人才。元代医学延续了北宋徽宗时期的太医学政策。1103年，崇尚道教与医学的宋徽宗把医学纳入太学系统，与太学、武学、律学并行成为官办正规教育的组成部分，实施三舍升试法，推行各地医学升贡制<sup>[17]</sup>。这一变革标志着官方首次认可了学医可以入仕的问题，为大批儒医的出现扫清了障碍，使得那些未能进入仕途的习儒者转而学医，对提升医生自身文化素养、提高其社会地位、推动医学普及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儒医，《宋会要》有言：“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sup>[18]</sup>洪迈言：“有薪人谢与权，世为儒医。”<sup>[19]</sup>元朝统一中原后，开始在地方设置医学校。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太医院使王猷因医学久废，建议设立医学校，《元史》有载：

世祖中统二年（1261）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sup>[14]2033</sup>

宋代分医学为9科，元代进一步分为13科。元朝13科中，有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小儿科）、疮肿兼折疡、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正骨科、祝由科和杂医科。宋朝原有的口齿兼咽喉科被分为2科，即口齿科和咽喉科，又新增了正骨科、祝由科和杂医科。饶有趣味的是，新增的这3项皆与阿拉伯医学有关。5世纪左右，塞种（Saka）之骨伤科医疗技术处于领先地位<sup>[20]</sup>。元代盛行骑术且战争频繁，骨折损伤明显增多，正骨单独成科顺理成章。广惠司的职能之一就是治疗在京宿卫士兵之因摔伤而致骨病者，骨科本身就是阿拉伯医学中最为擅长的部分。大德十年（1306），又将13科改为10科，将口齿科和咽喉科合并，祝由科和杂医科被并入相应之科，唯骨科单独成一科被留下来。

带入中原的色目医生大都谙熟眼科和骨科之术，不仅如此，中土的医生也到中亚、西亚等地交流。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城市哈马丹（Hamedān），曾担任伊儿汗国统治者合赞汗（1295—1304在位）的宰相。他在贴必力思（Tabrīz，今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附近修建了一座拥有学校、图书馆、天文台、作坊、医院、药房、清真寺、公共浴室等设施的科技文化中心，后被称为“拉施特镇（Rab‘-i Rašīdī）”。这里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医师，他们把针灸、脉诊、制作草药等传统中医治疗法以及一些著名的中医学著作介绍给了当地的伊朗人<sup>[21]</sup>。英国医学家西里勒·洛伊德·埃勒古德（Dr. Cyril Lloyd Elgood, 1892—1970）在其《伊朗医学史》（*Tārīkh-i piziškī-yi Īrān*）一书中讲到伊儿汗国的医学：“该医院有50名医师，他们其中有一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例如埃及、中国、印度、叙利亚。每位医师均负责数十名学生，除了这支庞大的团队，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大夫、眼科医师与骨损伤医师在这家医院中工作，他们每人至少也有5名学生。”<sup>①[21]</sup>拉施特在《史集·中国史》（*Jāmi‘ al-Tāwārīkh*）中也提到2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伊儿汗国统治者“从两位叫L.bbāhī和M.ksūn的乞台学者哪里获得了帮助，他们通晓乞台的天文、医术和历史，从乞台带来了一些有关的书籍”<sup>[22]</sup>。乞台，即契丹的音译，意指中国。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拉施特捐赠书》（*Vaqfnāmeḥ-i Rab‘-i Rashīd*）中还记载了来自中国的厨师、酒师、工匠、画工在伊儿汗国宫廷服务<sup>②[21]29</sup>。拉施特本人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组织编订的有关中国的书籍除《史集·中国史》外，还有《无族谱》（*šū‘ab-e Pančgāna*）、《遗迹与生命》（*Āthār va Ahyā*）等。

当时的拉施特镇已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汉语人才培训机构，有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向伊朗学生教授各类中国文化知识，拉施特在《伊儿汗国珍宝书》序言中提到了一位名叫siu se的乞台（中国）学者，由伊朗史学家莫季塔巴·米诺维纸笔完成的《伊儿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影印版的前言中称“这明显是那位叫

① 参见 Cyril Elgood (tr. by Mohssen Javidan), *Tārīkh-i piziškī-yi Īrān. Tehrān Iqbāl Vol. I*, 1973:447–448. 转引自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一书。

② 参见 Rashīd al-Dīn Faẓl Allāh Hamedānī. *Vaqfnāmeḥ-i Rab‘-i Rashīd*, Tehran, 1971:191–192. 转引自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一书。

Sī vān sī 乞台学者名字的转写”<sup>①[21]25</sup>。尽管目前对于这位中国学者的中文名字及其来历都无法考证。从东方大量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使得伊儿汗国的政治地位日趋稳定,经济得到了复苏与迅速发展。伊儿汗国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与伊朗及周边各地区的许多科技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也有交流和引进,并经蒙古人统治区域的西亚、中亚地区传入了中国元朝统治地区。另外,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西方欧洲国家也借助伊儿汗国获得了许多东方的先进科技<sup>[21]29</sup>。对于这些在拉施特镇的中国医生,在中国的正史中虽没有确切记载,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中西方医药交流的概况。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元代宫廷中也不乏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厨师、画工、医生,甚至建筑学家等,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元代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和明初形成的《回回医方》就是最好的证据。从元代医疗体系的发展到药物种类的增多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南村辍耕录》中就有对骨科手术的记载: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遏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起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sup>[23]224</sup>

显然,这种手术与阿拉伯医学技术的传播有直接关系。早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西亚等地就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医学体系,其中包括医学院的设立。阿巴斯王朝时期开设医学院和药剂学校培养人才,并采用严格的医师考试制度,医生和药剂师必须参加政府组织的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不得营业。元代在南宋医学的基础上设立医学校,进行严格管理,“精选各路医学教授,训诲医生,不得滥保空疏无学之人”<sup>[24]</sup>。医学校内不仅有医德高尚的人讲授科目,更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元史》卷81《学校》云:

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须试验。其各处名医所述医经文字,悉从考校。其诸药所产性味真伪,悉从辨验。其随路学校,每岁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具呈太医院,发下诸路医学,令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置簿,解纳送本司,以定其优劣焉。<sup>[14]2034</sup>

《元史》卷103《学规》云:

诸各路医学大小生员,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及在学而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教授、正、录、提调官罚俸有差。诸医人于十三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sup>[14]2638</sup>

是证,对医学校内老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要求。学生如果不能按太医院的规定完成学业,考试不合格者,则严禁行医,成绩优秀者可以从地方提拔到中央,逐步形成了一条从地方到中央选拔医学人才的通道。《通制条格》载:

大德九年五月,中书省礼部呈:泽州知州王祐言考试医学事理,移准太医院关送据诸路医学提举司申,各处设立医学,蒙都省令太医院讲究到合设科目壹拾叁科,合为十科,各有所治经书篇、卷、方论条目。拟合遵已定程式,为考试之法,不精本科经书,禁治不得行医。<sup>[25]</sup>

医学院的设立,为元朝培养了众多的医学人才,而学医者可通过医考进入中央机构,其地位并不比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低,故而有许多人愿意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晋升。尤有进者,元代科举兴废无常,立国一个半世纪,前后仅有48年行科举,共16考,录得进士1139人,与唐宋明清相比,进士数量可谓少之又少,不少儒生弃儒从医,以达晋升之目的。

#### 四、色目医与元朝民间医疗机构

元朝医疗面貌之变革与色目医在民间兴办医院息息相关。许多色目医生医术精深,受人尊重。有不

① 参见 Rashīd al-Dīn Faḡl Allāh Hamedānī, *Tanksūqnāmeḥ, preface*, Tehran, 1972:8. 转引自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一书。

少色目人在民间行医或以经营回回药为生，如畏吾儿诗人贯云石曾在民间行医，“卖药市肆”<sup>[26]</sup>，回回诗人丁鹤年在四明时“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行囊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盖数数然也”<sup>[27]</sup>。除了这些散存于民间的色目医生独自行医外，还有部分实力雄厚的色目人在中原不同地方开设医院，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来自埃及的富商鄂拖曼，他曾在杭州城内创办过规模较大的阿拉伯式医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64年游历杭州，曾宿于鄂拖曼家中，并著之于笔。马金鹏、张星烺、方豪等前贤都对这段文字做过翻译，大同小异。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

在此城我们寄宿于埃及人士奥斯曼·本·阿凡尼之子孙的家中。他是当地一大巨商，他十分欣赏此地（杭州），因而定居于此，该城亦因此而出名。他的子孙在此地继承了他的声望，他们一仍其父辈的怜贫济困之风。他们有一道堂，亦以奥斯曼尼亚著名，建筑美丽，慈善基金很多，内有一批苏非修道者。奥斯曼还在该城修建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sup>[28]</sup>

同样一段文字，张星烺译作：

第三日，进第三城……余寓埃及人鄂拖曼后裔家中。鄂拖曼乃大商家，甚喜汉沙城，故常寓此。城亦由此而得名曰鄂拖曼尼雅（Othmaniya），其子孙在此地亦甚受尊敬，善继父志，救济穷人。有贫僧来门求助者，彼赠之甚丰。创办医院（玉儿本作僧庵）亦名“鄂拖曼尼雅（Al'Otamaniya）”，建筑颇为华丽。此外各种慈善之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居其医院者甚众。鄂拖曼在此城尝造一回教大礼拜寺，名曰：“甲玛玛斯基特（Jama Masjid），并捐钱甚多，做维持费。回教徒在此者亦夥。”<sup>[29]</sup>

两种译本各有千秋，但将其中之niya（音译“尼亚”或“尼雅”）都解释为疗养院则是完全一致的。需要提出的是，鄂拖曼尼雅（Othmaniya）是带有公益性质的私人疗养院<sup>[30]</sup>。郭成美译作“鄂拖曼尼雅道堂”<sup>[31]</sup>，似不甚妥。宋元时，杭州有大量穆斯林群体，主要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鄂拖曼为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借由伊本·白图泰的描写可以推知，鄂拖曼是一位富商，以乐施好善、助人为乐闻名，在杭州建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和较好的公共建筑，并施舍福利基金供清真寺等公共事业开支<sup>[28]</sup>。依伊本·白图泰所言，鄂拖曼不仅兴办具有公益性质的私人疗养院，且其规模不小，并被后世子孙所承袭，享誉杭城。

在中外医学交流史上，印度及中亚、西亚都对中医有所影响，元代色目医除供职朝廷者外，民间也不在少数。据载，杭州、泉州、广州、大都等地寓居着大量阿拉伯人，其中就有医生，他们将阿拉伯地区的药物、技术甚至医学理念传至他们所在的城市。《南村辍耕录》“木乃伊条”：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瘞之。俟百年后，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sup>[23]42</sup>

这里出现了具有外国语色彩的名词“木乃伊”，该词在《回回药方》也出现，称之为“木蜜纳亦”，宋峴认为两者为同一词。但“这个词的词型并非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的木乃伊（Mūmiyāi）一词的原型，当与蒙古大军西征时在军中大量任用景教医生有关”<sup>[1] 前言 30</sup>。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医药一直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元代医学与外界的交流更广更深，不仅涉及药物、外科手术、医学理念，甚至触及中原地区医疗体制面貌的变革。在中央，设立了3个由色目人主持的回回医疗机构，即广惠司、大都回回医药院和上都回回医药院。在地方兴办医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医学人才培养、选拔体系，其状况与阿拉伯医学校几无二致，尤当首推元代中医新增的骨科，骨科是阿拉伯医学中最为擅长的部分，元代独立出来，自成一科，显然是受色目医影响所致。随着色目人大量入居中原，不少地方出现了色目人所开设的医院，以满

足散居在不同城市色目人的需求。元代医学面貌,尤其是医疗机构的变革与医科的改变,都与色目医学的影响息息相关。元代中华传统医学在医疗制度层面的深层次变革,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为嗣后中医在明清的巨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宋岷. 回回药方考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2] Juvaini AA.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Vol. I* [M]. Trans. Andrew BJ.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3]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上 [M]. 何高济, 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 [4] 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 [M]. 杨积庆, 校点.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367.
- [5] 邱树森.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J]. 东南文化, 2008(1): 49-54.
- [6] Komroff M.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M].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Inc., 1928: 239.
- [7] 鄂多立克. 鄂多立克东游录 [M]. 何高济,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5.
- [8] 李经纬. 中外医学交流史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142.
- [9]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 [M]. 冯承钧,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10] 苏天爵. 元文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593.
- [11] 郝经.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M]. 秦雪清, 整理.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 439.
- [12] 张田芳, 杨富学. 元代色目医与中原抗疫 [J]. 中医药文化, 2020, 15(6): 7-18.
- [13] 费琅.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52-153.
- [14] 宋濂.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5] 脱脱.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72.
- [16] 毕沅. 续资治通鉴: 卷 19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5261.
- [17] 永乐乐清县志 [M]. 陈明猷, 点校.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0: 171.
- [18] 徐松. 宋会要辑稿·崇儒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2217.
- [19] 洪迈. 夷坚志·甲志: 卷二 [M]. 何卓,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6.
- [20] 李迪.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 第 3 辑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103.
- [21] 时光.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22] 王一丹. 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研究与文本翻译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123.
- [23]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4] 元典章: 卷 9 [M]. 陈高华, 张帆, 刘晓, 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312.
- [25] 方贵龄. 通制条格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90.
- [26] 欧阳玄. 欧阳玄集·圭斋文集 [M]. 魏崇武, 刘建立, 校点.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104.
- [27]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313.
- [28]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M]. 马金鹏, 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405.
- [29]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 2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645-646.
- [30] 罗彦慧. 良方与奇术: 元代丝绸之路上的医药文化交流 [M]// 张勇安. 医疗社会史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51.
- [31] 郭成美. 鄂拖曼与回回拜佛堂上 [J]. 中国回教会刊, 1982(223): 20.

( 本文编辑 黄晓华 )